

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

鲁道夫·宾尼
郭灵凤 译

编者按：鲁道夫·宾尼，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2005年9月5日受邀在欧洲所做了关于“欧洲认同”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不同的争议。他从心理史学的角度描述了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向大家展现了欧洲认同源起的不为人熟知的一面。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未能讲完。本刊在宾尼教授的授权下，全文刊发他的演讲稿（刊发前，宾尼教授又做了补充和修改），以飨读者。

“欧洲认同”这个题目似乎有些语义模糊，但这并非我的过错。问题在于“认同”这个词可表示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因而，“欧洲认同”首先意味着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欧洲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众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者惯例。这是对“欧洲的”一词进行描述性地定义，而非仅仅指地理学上的欧洲。而另一方面，“欧洲认同”这个词还表示欧洲人之间的情感，即他们不仅是西班牙人或瑞典人，比利时人或保加利亚人，而且还是欧洲人。这种欧洲情感至少是与非欧洲人相对立的一种共享的骨肉亲情，是他们之间协调一致的利益，尽管欧洲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流血冲突，但这些冲突更像是家庭内部的争吵。我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土生土长的欧洲范围内的欧洲人意识，我要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并且要说明历史因素仍旧影响着今天的欧洲认同。

但是，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独特的欧洲情感是怎样的。除欧洲以外，还没有哪一片大陆发展出了这样的共同情感。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一些非洲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自称非洲人，但是开罗和开普敦彼此之间并没有感到文化或心理上的亲缘关系，而且它们与金沙萨之间也没有这种感觉。那么，为什么只有散

居于欧洲大陆的许多不同民族,只是在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一片山脉、半岛、岛屿构成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其他大陆没有的相互认同?尽管欧洲人在政治上分崩离析、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感觉到独一无二的相似性、甚至是同一性。为了对这种感觉探一究竟,我们必须将欧洲认同作为活生生的历史来探讨,从两个经常被混为一谈的方面来探讨,即外部世界眼中的欧洲特性和欧洲人在强韧的地方和民族纽带之外对欧洲大陆的亲密感情。我希望能够理清欧洲认同的这两个方面,即观察到的欧洲认同和感觉到的欧洲认同,并能够给传统的历史描述增添一些新内容,用以解释欧洲人之间深切感受到的认同以及共同命运。

欧洲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一个独特存在的单位,这种观念的历史通常要追溯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被认为是欧洲一统(European oneness)的原型,是第一个开始勾勒今天欧洲地理轮廓的庞大的政治主权国家,此外它身后还留下了引人瞩目的有形、无形遗产,其中包括道路交通网和法律体系。然而,事实上,罗马帝国原型并不存在。的确,在公元三世纪初,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被宣称为帝国的公民,使用同一种语言,受到同一种统治。但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是地中海,而非欧洲。它在欧洲的领土并不比在非洲或亚洲的多。另外,不论是观察到的认同或感觉到的认同,欧洲认同的原型不可能是政治性的。因为自罗马帝国衰落乃至覆灭,欧洲已经裂变为一群混乱的不稳定的政治主权国家,它们抗拒一切使之臣服于更高一级单一政治权威的努力。公元800年左右,法兰克人征服者查理曼大帝接近了封建大领主的目标,但是时间非常短暂,而且是在相对狭小的领土范围内。尽管加洛林帝国全部在今日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它的领土甚至比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还要小。查理曼曾一度称自己的帝国为欧洲,但是像那些发明了“欧洲”这个名称的希腊人一样,他只是以之表示他所统治的土地。此外,他的帝国是以个人忠诚维系的,并不存在对领土或皇权的忠诚,更别说一种大陆精神了。在创立者去世之后,法兰克王国很快被查理曼的子孙分裂为三部分,只是日耳曼人占据的三分之一东部领土还残留着帝国陈旧的记忆。因而,东法兰克王国在10世纪时宣称是古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者,并自称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头衔堂皇却阴影重重的帝国一直与罗马教会竞争普世(而非欧洲)统治权。在1806年寿终正寝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失去了所有不稳固的权力和黯淡的名声。此后,拿破仑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或者至少统一欧洲大陆以对抗英国,结果证明是自取灭亡。因为,武力征服的后果是民族主义浪潮处处高涨,最终导致了这位暴发户皇帝的

覆灭。后来的希特勒,更粗暴地要在种族原则下以武力统一欧洲,结果遭遇了更为迅速、惨烈的失败。就是王朝联姻也不能长久地巩固欧洲大家庭。当年,最杰出的王朝统治者、16世纪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宣称要通过王朝婚姻在他的领地内实现对欧洲的统一,因此他与700年前的查理曼大帝一样,只是在自己有限的欧洲领土上使用“欧洲”这个词。最终,欧洲各国没能达成一致意愿,实现统一的政治行动,一个自愿的主权欧洲联盟计划一直是个幻影。目前西欧的共同市场、共同议会以及共同货币已经比早先任何联邦的努力走得更远了。但由于缺乏整个大陆的参与,它们仍旧不能继续进展,更不用说获得超国家权力了。很明显,这些欧洲国家并不打算彼此走得更近,最近法国和荷兰公投相继否决欧洲宪法草案就是例证。这份宪法草案并不是包容整个大陆的,而仅仅是政治一体化的努力,这大多来自法兰西的灵感。总而言之,不管构成欧洲一统的要素是什么,它不仅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它拒绝成为政治性的。

人们经常说欧洲人之间非政治性的大家庭情感在中世纪已经逐渐形成了,它建立在遍及整个欧洲大陆、贯穿独特的欧洲文明发展全过程的某些实实在在的基本要素之上。这种观点认为,独一无二的欧洲文明的基础,首先便是共同语言(拉丁语)和罗马法。接下来是基督教、封建主义以及环绕城堡、市场、教堂和墓地周围的、外表类似的村庄。然后,据称在此基础上,12、13世纪出现了一个新欧洲秩序。这一新秩序的特征是骑士制度和贵族阶层的宫廷礼仪;自治的公社;行会、集市和银行;市民阶级,家庭财产长子继承的等级社会;教会法、宫廷和陪审团;罗马式以及哥特式艺术;经院哲学浸染中的大学;以精致的俗语吟诵,后来又被记录下来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在欧洲人中间发展起来的欧洲情感确实是来自这些大量的独特的欧洲历史现象吗?所谓欧洲特性论的一大问题是大多数数据说是欧洲独有的历史现象却主要、甚至只是西欧的现象。但这种观点最大的漏洞还是逻辑问题:采用相同的制度、习俗并不能产生和维持共同意识,否则,按照这种说法,这些制度、习俗的逐渐消失也会侵蚀了共同意识。以曾经是统一的欧洲语言的拉丁语为例。罗马统治地中海沿岸时,希腊诸岛之外欧洲惟一的书面语言就是拉丁语。后来,尽管拉丁语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教会语言,但随着人们读写能力的退化,它渐渐不被使用。查理曼大帝出于政治和学术的目的曾经复兴拉丁语,然而在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拉丁语都逐渐让位于地方俗语。如果拉丁语曾经成为欧洲意识的基础,那么甚至在拉丁语的鼎盛时期,欧洲意识也只是局限于知识阶层(或者官僚阶层),到18世纪末拉丁语就走向灭

绝,甚至在它的最后据点——大学中,也不再使用拉丁口语。再以封建主义为例。封建主义不仅最初产生于西欧,各地发展参差不齐,甚至比拉丁语更短命,而且封建农奴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也不可能感觉到自己成为欧洲人,除非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庄园劳动者进行比较,觉察到自己在封建欧洲社会中的身份。这显然是荒谬的,总的来讲,一个农奴的视野是非常局限的。再谈谈罗马法。如果说罗马法是欧洲的基石之一,那么这块基石已经支离破碎了,留下来的仅仅是罗马法在欧洲的残余物,掺杂进了各种地方惯例。再说哥特式建筑,它的确是欧洲特有的建筑风格。12、13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影响从法国北部向整个欧洲辐射,在此过程中不断融合各地区的建筑风格。但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因其笨重、丑陋而否定了哥特式建筑。今天哥特式教堂仍旧是欧洲城市风景的醒目标志之一,但是拥有这样教堂的城镇之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一种亲近感,更不用说那些并没有哥特式建筑的地方了。至于那些幸存下来、并在现代发扬光大的所谓中世纪欧洲文明构成要素,如大学、银行和市民阶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是专属欧洲的特性了。总而言之,这种说法只是展现了感觉到的欧洲认同是怎样从历史学家描绘的中世纪欧洲文明中得出的。

在历史学家经常提到的中世纪欧洲的特征中,基督教以其共同的宗教信仰、多姿多彩的宗教仪式和以十字架为代表的无处不在的宗教标志符号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无论从其起源还是从其自我定义来讲,基督教都不是欧洲特有的。基督教原本是东方的一种神秘崇拜,宣称代表着普世真理。早在传播到欧洲之前,它就从亚洲传到了非洲。4世纪初,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他正是在亚洲召开了公会议以制定标准的基督教教条。他还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位于亚洲之端的拜占庭,重新命名其为君士坦丁堡,并大兴土木重建使其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一座城市。此后,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得到进一步传播,首先是在帝国城市中,然后慢慢渗透到乡村,在来自东方的异教徒中也得到传播,最后越过原罗马东方、北方行省的边界传播到了未开发的地区。基督教在欧洲越兴盛,欧洲越忽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皇帝。到伊斯兰教徒开始占领原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之后,这种情况更突出了。教皇或称罗马主教为一个基督教欧洲的皇帝查理曼加冕,以对抗居住在君士坦丁堡、自称为普世的基督教皇帝。但是,查理曼死后,他的帝国分崩离析,演变为封建割据,并屡次遭受异教徒的劫掠。直到异教抢劫者中危害最严重的北欧人和匈人最终定居并皈依基督教,这些灾难才告结束。1095年,重振旗鼓的欧洲

基督教开始一系列军事远征,即所谓十字军东征,要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地,并征服东罗马帝国。这次冒险失败了。但是,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欧洲大陆以武力赢得了更多领土,他们向南驱逐了占据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武力征服波罗的海的异教徒之后,迫其纷纷改宗(在波罗的海地区,只有立陶宛是自愿改宗的)。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东罗马帝国与之日益敌对,少数散落的基督教飞地也日渐凋敝,教士和绘制地图者渐渐将基督教等同于欧洲。欧洲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引起争议,甚至在奥斯曼土耳其人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征服中南欧洲之后,东罗马仍然在文化上吸引着基督徒,这种平衡一直保持着。确实,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基督教的”和“欧洲的”益发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虽然这种用法不合逻辑。由于土耳其人对欧洲持续不断的威胁,一个共同欧洲基督教的概念一直延续到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时期,此后基督教分裂为许多教派。当然,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和“欧洲的”这两个词仍然不时地交互使用。直到18世纪的时候,世界主义的、世俗化的启蒙运动才最终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分开。

基督教宣扬信众精神同一,因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教会”。然而基督教实现的精神同一不过是一个关于欧洲的浪漫神话,最终毁灭于法国大革命之中。事实上,基督教是通过权威强加于欧洲的一种秩序,因此它只是缓慢地、并不充分地渗透到起初不情愿的改宗者心中。直到中世纪末,大部分名义上的基督教欧洲也只是在低程度上基督教化了。在欧洲,通常基督教信条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所不在的魔鬼、恐怖的末日审判以及由一位具有无限同情心的人类母亲所生的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另一方面,西欧的基督教圣徒、游行、弥撒、宗教节日和圣像与东部拜占庭僵硬、程式化的东正教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东西分裂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曾产生一种共同的基督教世界或者信仰共同体的感觉。保卫基督教世界或欧洲的战斗号召可能会召集西方骑士对抗来自伊斯兰教徒、撒拉逊人、蒙古人、塞尔柱土耳其人或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共同威胁,但是基督教欧洲作为一个被围困的信仰堡垒的印象并没有留在欧洲各地普通人的心上。甚至在教士或骑士之中,只要罗马教皇们敦促为了夺回耶路撒冷或者解救身陷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而攻打东方,那么抵御异教徒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就不可能带来稳定的欧洲大陆地理概念,更不用说教皇们一直宣称对于全世界的精神统治权。如果不提欧洲之外的基督徒和欧洲之内的非基督徒,不提基督教起源于东方并自称普世宗教,也不提东西欧两种基督教在信仰和实践上存在

着根本的差别,我们可以说,12或13世纪时,与欧洲地理上大致重合的基督教世界确实组成了一个初级集体单位。同时,这个初级集体单位的底线需要强调:那时候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象欧洲(Europe)一样,至多是外部界定的一个名词,内部并没有形成联系,大致相当于区别于东方(Oriental)的西方(Occidental),只是12或13世纪惯常使用的一组概念。甚至在土耳其的征服使中南欧前所未有地东方化了之前,所谓的东方就包括中南欧洲,因此基督教世界这个词与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就造成了概念冲突。

比基督教、比外部看到的欧洲特征和内部看到的欧洲特征更具有说服力的欧洲认同因素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几次大的文化运动,尤其是古典主义、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尽管它们主要流行于西欧精英阶层当中,但无疑这些文化运动蔓延到了整个大陆,渗透到民间乡村,在最底层的文化生活中也能够看到其影响。另外,欧洲的民间文化也渐渐跨越国界,在欧洲内部相互交流。这种跨欧洲文化融合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一种新的欧洲共同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末逐渐出现。这种新语言就是欧洲音乐的大调、小调曲调结构,这是遍及全欧的音乐,在欧洲之外不存在。文艺复兴以来全欧文化运动的正例和反例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一个欧洲精神联合体已经成形了。但是,同样明白无误的是,这些欧洲精神联合体的表征并非形成这个联合体的原因。因为,在欧洲历史上从未获得象现代南美洲那样的文化共性,更不用说宗教和政治共性了。此外,现代南美洲是更为完整的一个地理单元,但是南美洲人丝毫没有大陆认同的意识。很明显,除了以上提到的种种因素外,当时的欧洲应该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可以解释那种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势均力敌的深藏的欧洲大陆认同。

这个“其他因素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其他因素 就是一场全欧范围的群体大规模创伤——黑死病。这场恐怖、无情的疫病发源于小亚细亚,1377年底传到了西西里,很快就在欧洲大陆四下传播开来。欧洲遭受这场瘟疫的致命打击之初,还缺乏完整的欧洲意识,所以,严格说来,黑死病并不完全是一场欧洲的创伤。欧洲各地对黑死病的最普遍或最典型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随着瘟疫传播,欧洲人从心理上团结起来,几个世纪后最终形成了完全有意识的欧洲观念。这种最终形成的欧洲意识起初不过是一种已经一起成为了致命攻击目标的感觉;确切地讲,这是一种正在一起成为致命攻击目标的感觉,因为这个创痛的时刻在历史记忆中一直是现在时态。但是,“欧洲”(Europe)这个词并不产生于这种严酷的体验。它首先还是

一个地理学名词,黑死病肆虐之时,比起同义词“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它并不常用,甚至有些废弃不用了。“欧洲”大陆所指的地理范围在各种地图中并不一致,而且从未到达今天的北欧或东欧这么远。即使这样,遭受瘟疫打击的人们通常将自己看作是基督教牺牲品,他们最终形成了一种初级的欧洲认同。早些时候,“基督教世界”面临共同外部威胁时,同样产生过这样的欧洲认同。在这里,我要重申,“基督教世界”指的是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群体;然而,在现实中,它指的是欧洲领土,尽管它从未将自己限定于欧洲,也从未扩展到整个欧洲。我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些观点,是为了使大家理解这场创伤的实质。1347-1352年,这块北部和东部边界并不确定的大陆是基督教的根据地,在它的中南部正受到东方异教徒的威胁。就在此时,欧洲大陆遭受了来自东方的一场致命鼠疫,它来得突然、迅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并且不加区别地重创了各个阶层,在最初的冲击中所到之处有一半居民失去了生命,之后又一再地区性地复发。黑死病马上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蔓延到俄罗斯,那时候欧洲人还并不认为俄罗斯人也是欧洲人。直到1352年,黑死病才告一段落,它传染了几乎今天欧洲整个版图,只有冰岛幸免于难。

我已经提到黑死病造成的全欧范围的巨大创伤使欧洲人从心理上团结起来,即使这种团结并不是马上以欧洲的名义实现的。这个论点涉及了心理史学研究中长期使用的两个概念,在这里需要对它们做一界定。一个是集体心理凝聚(psychological coherence within a group),即在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之时,集体成员无意识地共同行动。心理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群体过程”(group process)。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从古代以来,动物社会能够集体适应改变着的生活环境。同时,人类社会中类似的现象却常常被忽视,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自以为,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的行为是出于有意识的个人目的的个体行为。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甚至在实现有意识目的的时候,个人可能还追求着自己并不知道的其他结果,无意识的结果。同样地,历史记载显示,在追求个人目的的同时,个人或许还加入了群体的无意识过程,而他或许并不知道属于这个群体。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神秘,但是更神秘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已经写了一本书来探讨人类历史上的群体过程,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自发的人类群

体是如何集聚和记忆的,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有两个例外情况,一种是象国家这样的群体,是完全公开、有意识地形成的,另一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第二种情形中,大部分无自我意识的群体是产生于遭受过共同的创伤,14世纪中期的欧洲意识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共同遭受创伤的人以整体的创伤为理由,将外在的认同内化,不论如何微弱,他们会将这种内化的共同认同传给子孙后代。1347 - 1352年遭受鼠疫的欧洲人感到的这种外在认同,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基督教的。因为在瘟疫袭来之初,他们就认定这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惩罚,除了有些时候他们将其归罪于犹太人,当然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基督教的解释。但是,随着瘟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传染了基督徒、犹太人、异教徒,同样在基督教社会内部,不论是圣人还是罪人都受到传染,而且每一类人中都有幸存者。很明显,这场瘟疫既不是上帝的正义惩戒,也不是犹太人的罪恶勾当,而是从外部降临欧洲的一场必死无疑的尘世宿命。因此,群体认同从基督教转向了欧洲。

我分析欧洲认同追溯到创伤性的黑死病的时候,谈到了另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创伤”(trauma),这个词用在这里超越了其原本的狭窄含义。“创伤”这个词来自希腊语,起初是指身体上的损伤,后来引申指精神上受到的严重打击。最近,精神病学逐渐把这第二种含义限定为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种种暴力或虐待的体验,受害者日夜焦虑不安地回忆这些体验,或者以病态结果将其推出有意识的记忆。心理史学已经揭示出更多其他创伤体验的潜在危害,比如受害者倾向于将创伤解释为应得的惩罚,欧洲人起初就是这样解释黑死病的。但是,无疑,在心理史学的解释系统中,创伤最重要的后果是,受创个人或群体不知不觉地再现创伤。通常是经过伪装、以完全不同的身份,受害者再次使创伤产生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后果在测量过程中或许被夸大。这种所谓的创伤再现,尽管很少见,但已成为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令人迷惑的一些历史片断的动力。

起初,黑死病是毫无伪装地再现,在几个世纪中,它不时在欧洲各地复发,发病症状大致相同,尽管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爆发频率也日益下降。通常,黑死病的复发被视为凶险的病原体一再传染的结果,但是,疾病必然是病原体与抵抗力或强或弱的宿主相互作用的结果。黑死病病原体不止一次地被错误诊断,直到如今还是难以捉摸。我们只知道这种病原体对受害者一视同仁,瘟疫蔓延之处,不论城乡、贫富、年青还是年老,一律不堪一击。第一次瘟疫过后,大约一半人口幸存下来,其中包括约三分之一的感染者。因此,第一次瘟疫后幸存人口中的一

半由于天然的免疫力而逃过了感染,而另一半人熬过了瘟疫,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非遗传的免疫力。如果首次瘟疫爆发十年后,黑死病再度在当地复发时,具有天然免疫力和获得免疫力的人都还具有免疫力,那么新的受害者就会是所有十岁以下的儿童,并且可遗传免疫力基因库的四分之一会发挥作用,二次爆发时全部死亡人数会降至这个地方十岁以下儿童人数的四分之三。但事实上,所有迹象表明,死亡人数远远高于这个估计。尽管死亡人数较第一次爆发时明显减少,而且从年龄分布状况来看,新的受害者大多是儿童。现存的数据不足以使我们这样推论,如某些十岁以上的欧洲人丧失了免疫力(天然的或非遗传的)。另一方面,编年史作者所作的、可进行比较的各地一波接一波的瘟疫记录,最终清楚地驳斥了任何完全崭新的病原体出现在不同时间段的瘟疫中。那么,很清楚,两段瘟疫之间,人们丧失了免疫力,或者说抑制了免疫力。黑死病并不是简单地复发,而是欧洲人集体再现了它。

此后,不管标志如何变化,欧洲人在新建立的集体认同中一致行动,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共时性”在一场社会暴乱中被喧闹地呈现出来。圣丹尼斯编年史恰当地称这场暴乱为“叛乱瘟疫”,它如同传染病一样从地中海沿岸蔓延至法国、佛兰德尔、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在黑死病之后向东传播,于14世纪70年代中期最终将整个大陆都卷入这场暴乱中,恰如上一代人经历的致命瘟疫的第一次大爆发。1347-1352年之前,欧洲已经有过零星的地方民众抗议,但彼此时间并不重合。然后,瘟疫流行引发了大量与瘟疫有关的基督教性质的群众暴力活动。这些活动都没有领导者,例如苦行赎罪游行、在公共场合自我鞭笞赎罪,病人一起边唱边舞,谴责犹太人带来瘟疫、举行仪式对之处以火刑。参加活动的人不分阶级,也没有具体的世俗目的。瘟疫第一波之后,这些病态的宗教狂反过来引发了具有明确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的民众叛乱。14世纪50年代叛乱数量呈上升趋势,到了14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激烈、血腥的起义日渐普遍,其一致的目标是反对社会特权或追求人人平等。正如这场社会传染病反映了黑死病致命的危害和迅疾传播的方式,它平等主义的追求同样来自于那场瘟疫所启示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题,正如俗语所说,“死神是个平等主义者”(“Death the Leveler”)。肯定的一点是,那些血腥的起义都是由于地方的生活和劳作环境,或者财产和权力状况导致的。但是,它们依照创伤再现的方式,复制了群体伤害的黑死病创伤体验,即通过伪装,以积极的作恶者取代消极的受害者,相应地将目的和意义融合到原先那种无意识的屠杀中。

在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欧洲人都象征性地再现了黑死病的创伤体验。这种再现最集中体现是广为流传、异常恐怖的死者之舞(Dance of the Dead)。瘟疫经常损伤神经系统,造成肌肉痉挛,看上去好像令人毛骨悚然的舞蹈。死者之舞起先是配合教堂墓地布道时的曲调表演的,然后成为传遍欧洲的诗歌,此后又被雕刻和描绘为壁画。最后,所有欧洲的教堂和藏骸所的墙壁上都可以看到死者之舞的壁画,此外,它也通过无数的印刷书籍、廉价唱本、祈祷书流传开来。如今德国和法国还在争论是谁最先以文学形式表现死者之舞的。1348年后不久德意志南部多米尼克修道院修士的著作权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紧随其后问世的法文版本启发了大多数外国模仿者。在死者之舞早期的形式中,中世纪社会等级中的中坚人物,从教皇、皇帝到国王,都被不同装扮的死神使者相继严厉诅咒,这位死神使者或是干瘪如木乃伊或是干枯如骷髅,它时而拉琴、时而敲鼓、时而吹号、时而鸣笛,丝毫不理会凡人的抗议或哀求。这种大规模连续死亡的简单剧情,很明显是在重演瘟疫的创伤体验,尽管与历史原型有一定距离。欧洲人通过舞蹈、音乐、诗歌、图像在想象中重现了黑死病的历史原型,假想控制了这场大规模的灾难。受害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因而代表每个人,象征欧洲社会是一个整体。不管怎样,每一个受害者都被死者之舞带到了地狱,不能暂缓死亡,也没有末日审判。在对黑死病进行想像的基督教化的时候,骤然死亡被视作突然的全体诅咒。创伤再现中同样典型的是,与缓解创伤打击的努力相反,死者之舞吸收了黑死病的特点,死亡的暴烈代表了死亡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不论遭受瘟疫与否,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最后,死者之舞和所有创伤再现表演一样,都包括抵抗创伤打击的失败努力,在表演中,死神在想象中被围困住了,人们迷信舞蹈是一种反抗死亡的特殊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死者之舞中木乃伊式或骷髅式的死神使者在民间流传的雕版画中变得古怪诙谐,好象他们分享了一些淘气的、恶作剧式的秘密。他们对新加入死亡队伍者也不再冒失无礼,因为一对一的险恶的、愤世嫉俗的舞伴减少为一个布道的领舞者。由此,死者之舞演化为一种抽象的死神之舞,回响着一种普遍的曲调,成为死亡的形象化比喻,完全脱离了它所暗示的创伤体验。从16世纪30年代以后,死者之舞从文化活动中渐渐消失了,直到它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

1772年,黑死病在1352年第一次暂停的地方——莫斯科地区最终停止了肆虐,这次又有10万人丧生。因而,欧洲人也停止了通过亲身体会重演瘟疫,只是继续象征性地再现瘟疫,或更确切地讲是再现象征性的再现。1773年开始出

现了反映死者之舞的讽刺性的中世纪民谣,随后又出现改写的民间曲调“死神与少女”。整个黑死病的文化遗产又一项项复活了,复兴的新作品以一种自由、轻松的幻想剧的风格,在原来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变化。它不再重复旧日圣经中的说教,也不再承担高深的社会寓意,就如大胆地革除了脓包、汗水、热病、恶臭和腐烂等过去种种活生生的现实。整个漫长的19世纪,从浪漫派到颓废派,死亡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被色情化。死者之舞及其伴随的黑死病主题被花样翻新地解构、重组、颠倒、注入新的色情病态元素,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同样加入了这场狂欢。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精神恐惧的事件;相反,这场集体大屠杀的文化遗产被反复利用,成为类似戏谑的色情文学。尤其是在视觉艺术中,死亡和垂死不再如中世纪作品中那般程式化,不再如文艺复兴作品中那样理想化,也不再如巴洛克艺术作品中那样戏剧化;反之,在黑死病的艺术遗产没有以一种轻浮的讽刺或黑色幽默的风格再现的地方,对人类肉体腐烂的画面的想象被推向极致,令人作呕。另外,在黑死病之后出现了政治、社会起义(或者称为“叛乱瘟疫”)的大规模升级。欧洲以一场划时代的新型“叛乱瘟疫”纪念黑死病爆发500周年,这场革命瘟疫于1847年末在西西里爆发,1848年初席卷了欧洲大陆。

这就是欧洲经历的黑死病创伤体验的种种症候:周期性地真实再现这场瘟疫,以社会事件和文化活动再度重塑它,一旦瘟疫灭绝后又再版这种重塑。黑死病创伤的余波长达几个世纪,足以证明这次创伤的强度。然而,对于今天的欧洲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创造了欧洲意识的结构性的创伤又留给欧洲意识不可抹去的胎记。疫病流行欧洲大陆,各个阶层无一例外地遭受打击,欧洲人口的生存面临威胁,这促使这个大陆在心理上团结起来。因此,黑死病在欧洲人中间创造了永久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共同面临致命的、影响到全体欧洲人最深层次的生存问题的危险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危机时刻的团结。这种创伤性团结的作用是肉眼不可见的,但是,通过“群体过程”这个棱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始于18世纪70年代中期的所谓欧洲人口生产变革背后的推动力就是这种创伤性团结。19世纪前半期,欧洲人口死亡率(主要是儿童死亡率)大大降低。尽管欧洲人大批、稳定地向海外移民,欧洲人口总数在三代人之后增加了将近六倍,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次人口狂潮或欧洲人面临的生存危机,与黑死病导致的欧洲危机团结遇到了一起。结果是,新的创伤体验没有重演,而是采取了健康有益的适应措施。欧洲人用简单、直接、却是革命性的方法集体抵御了人口暴涨的危险:将欧洲大陆所有阶层的已婚家庭的出生率控制正规化,从而降低了出

生率。整个大陆几乎同时推行了这个措施,俄罗斯是最后实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通过集体反省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们意识到这种危险之前,并没有一对夫妇为了欧洲的利益节制生育。这就是群体过程的运作。根据历史记载,以前结婚生育是一种道德义务。因此,毫不奇怪,在人口生产变革过程中,欧洲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竞相揭露婚姻的伪善、堕落和不道德,简而言之,婚姻就是罪恶。以往欧洲人将黑死病想象为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惩罚,这种新的罪行又是那种旧罪恶感的遥远的梦幻般的反映。与毫不察觉的旧罪行相比,新罪行造成了奇异的感觉,因为欧洲通过节制婚内生育抑制了人口威胁,然而1348年欧洲人只是想象他们自己招致了黑死病。

历史永远不会消逝。现在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失败,反映了欧洲认同的创伤性的历史起源。当前引人注目的政治一体化行动,如同以往一样,发端于西欧,也就是最早遭受黑死病打击的地方。而且,一体化进程,如同黑死病蔓延的轨迹一样,从西欧扩展到了东欧。启动欧洲一体化是基于对欧洲不可饶恕罪行的悔改,特别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罪行,战争如同黑死病一样残忍、无意识地大屠杀,造成尸体堆积如山。阻碍欧洲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反映了1348年欧洲地区和城市为了阻止瘟疫蔓延实行隔离的记忆,尽管黑死病将欧洲人在心理上团结在一起。欧洲人对于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土耳其本能的不信任,可以在1347-1352年的创伤体验中得到解释,黑死病正是从今天的土耳其那个地方传到欧洲的。“欧洲计划”也是遭受过瘟疫的欧洲回忆起欧洲人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努力保卫家园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不论威胁是军事、商业危机,还是政治胁迫、文化腐败,恐怖主义或者传染病,这些都被欧洲视为威胁。总而言之,尽管表面精致,欧洲人的欧洲人情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病态。或许这种说法过于刺耳了?最后,所有的生命过程都是与死亡进行的一场必败无疑的搏斗,因此,1347-1352年欧洲创伤的遗产,就其病态而言,并不特别。事实上,它可以被看作创伤病理学的一个特别病例——人类历史受到危险侵害,这种致病机理被误解、忽视、回避的时间越长,人类遭受侵害的情形就越危险。

(责任编辑:宋晓敏)

REVIEW S

132 European Identity: Its Historic Origins

RUDOLPH B in ò n

European Identity can be approached in two aspects: its perceived identity and its felt ident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trace the historic origins of the native Europe-wide sense of being European, the feeling among Europeans deep down that they share a common identity and a common fate. From Roman Empire on, political projects for a voluntary sovereign European union keep proving visionary. The diverse European states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get their political act together by mutual consent. A felt European identity can't be derived from the medieval model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lso. That Christianity actually realized such spiritual oneness in Europe was Romantic myth about the Europe that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stroyed. Europe's great cultural movements from the Renaissance,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omanticism were signs of a European unity of spirit, but not its cause. The article finds that a European trauma - the Black Death in 1347-1352 created the continental consciousness. The pandemic spread its poison throughout Europe in all walks of life indifferently, threatening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population that it thereby joined together psychologically. During several centuries, Europeans relived the traumatic Black Death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in social revolts so called "the plague of a rebellion" and in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the Dance of the Dead. The lasting bond that Europe's trauma-Black Death created among Europeans amounts to a crisis solidarity in the face of a deadly common danger.

144 Review on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N Zhaoying

ACADEMIC ACTIVITIES

152 The Second Workshop on "China-Fr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ZHENG Chunsheng